

TOWARD EFFICIENT AND 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中国经济 增长的效率与结构 问题研究

徐建国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OWARD EFFICIENT AND 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中国经济 增长的效率与结构 问题研究

徐建国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与结构问题研究/徐建国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3

ISBN 978 - 7 - 301 - 20399 - 6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中国经济 - 经济增长 - 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2880 号

书 名: 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与结构问题研究

著作责任者: 徐建国 著

责任编辑: 仙 妍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0399 - 6/F · 312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em@pup.cn

印刷者: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10.25 印张 164 千字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 前言 关注增长的效率和结构 <<

本书尝试探究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些效率和结构问题。整个研究的基本指导性框架是：中国经济已经取得的成就与仍然存在的问题，都源于渐进性的改革。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从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对外开放促进了改革的进行。然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表现为在实践中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具有被动、滞后、不彻底、需要不断推进的性质，否则不断暴露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问题越积越深，最终解决起来可能会更加困难。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中出现的問題，都可以归结到改革进程的放缓和停滞。

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效率和结构问题，要置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从1979年到2010年这32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经济总量增长了20倍。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260美元，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倘若这一增长态势能够保持，我国将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稳步迈进。从数据上看，倘若能够保持年均6%的增长率，到2030年我国人均收入将步入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背后的福利含义是惊人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13亿多人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国度里。福利含义的巨大可以通过比较得到更加清晰的显现：2011年高收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总人口也只有12亿，这里面还有一些国家不是高收入国家，如土耳其、墨西哥。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0年高收入国家的总人口为11.2亿。

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早已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广泛关



注,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更是誉之为“中国奇迹”。奇迹一词醒目地表达了这一不同寻常的巨大成就,也引人深思其背后的机理和可持续性。倘若奇迹只是一个不合常规的例外,是否可以持续就是一个问题,这种担忧得到一些观察数据的支持。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是一些结构性问题已经开始凸显,其中包括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份额下降、消费占 GDP 比重持续下降、投资和净出口占 GDP 比重增加、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拉大、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拉大、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服务业发展滞后、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能源需求紧张,等等。

这些问题本身都是经济结构方面的症状,但同时也反映了更深层次的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弊端。经济结构时间序列上的变化,反映了经济体内资源的占有、分配和使用的情况。经济结构的跨国比较,也可以提供经济结构异常的信息,启发和帮助进一步的分析,找出背后的原因。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异常,反映了资源分配和配置的变化以及经济效率的高低,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一些重大的效率和福利问题,包括经济增长是提高了大多数居民的福利,还是阻碍了很多居民从增长中得到实惠;是体现了对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还是大量浪费了资源;是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还是寅吃卯粮,不可持续。

本书中各章研究的问题,都是作者回国以后所关注、观察和思考的题目。这些题目视角不同,但是都和经济效率与结构密切相关。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思考的视角和维度与已有研究有所不同,以期抛砖引玉,引发读者一些建设性的思考,为讨论相关问题提供启发、视角和思路,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与结构问题研究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随着研究的深入,作者对此体会愈发深刻。未来的研究,当在总结过去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基础性框架,对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结构问题给出逻辑一致的解释。

作者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各位师长长期一贯的教导与帮助。作者有幸于 1997 年进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读,得到陈平、海闻、胡大源、林毅夫、卢锋、平新乔、宋国青、汪丁丁、易纲、赵耀辉、周其仁等各位老师的教诲,特别是宋国青、周其仁、赵耀辉、胡大源几位老师在治学上的悉心指导。在经济中心的学习,为作者形成自身看待问题的角度、方法、观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此后游学海外多年,然此烙印从未褪去。多年后毅然重返当初求学之

地,就源于此。“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以林毅夫为首的各位老师创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学布道,作者就是受益者之一。

作者特别感谢导师宋国青先生。先生双目时常微闭,话语不多,然开口必直中要害,让人思路豁然开朗,见前所之未见。学生资质鲁钝,正是先生多年来的点拨和启发,才稍微摸到经济分析的门槛。作者还要特别感谢周其仁先生。先生是智者。观察真实世界的目光,在英美的图书馆里愈发犀利,游走于中国的乡村和城市。一语中的的背后,是毕生不懈的磨砺与追求。得到两位先生的言传身教,乃此生之大幸。

本书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众多师友的多方协助。著述艰难,对初入门者愈发如此。没有巫和懋老师的督促和建议,书中的这些文章恐怕还是一堆散乱的文稿。研究过程中,冯时、杭静、潘莉、王子、张勋等学友在文献搜集、数据处理、文稿校对上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帮助。在写作过程中,与黄益平、李力行、薛兆丰、张斌、张帆、周道宏等人的讨论,也使作者受益匪浅。本书的研究,还得到北京大学优秀青年学者基金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如书中存在疏漏与错误,由作者完全负责,肯请读者见谅。

作者

2011年11月1日于北京

>> 目 录 <<

第一章 1978 年以前的增长与结构问题	(1)
第一节 引言:以史为鉴	(2)
第二节 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增速并不慢	(4)
第三节 居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	(7)
第四节 经济结构问题古已有之	(15)
第五节 资源集中占有是根本	(22)
第六节 收入分配是经济结构的基础	(26)
第七节 总结性讨论	(34)
第二章 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停滞”模式	(38)
第一节 引言	(39)
第二节 战后经济增长的基本事实	(45)
第三节 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51)
第四节 两组比较	(59)
第五节 结论与政策含义	(61)
第三章 城乡差距的产权基础	(68)
第一节 引言:城乡差距	(69)
第二节 资本,收入和产权	(73)
第三节 城乡差距的产权解读	(82)
第四节 结论性评述:推动新一轮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90)

第四章 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汇率原因	(94)
第一节 引言: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	(95)
第二节 服务业发展的时间序列变化	(99)
第三节 服务业、净出口和汇率变化的相关性分析	(104)
第四节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12)
第五章 内部风险与外部失衡	(115)
第一节 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失衡	(116)
第二节 数据描述	(120)
第三节 外部失衡的决定因素	(124)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31)
第六章 能耗需求与产业结构	(136)
第一节 引言:“错失”的能源效率进步	(137)
第二节 文献综述	(139)
第三节 中国能源消费现状:能耗强度 1978—2002 年持续下降 以及之后的停滞	(142)
第四节 能耗强度与产业结构	(149)
第五节 回归分析	(154)
第六节 本章小结	(157)

>> 第一章 <<

1978 年以前的增长与结构问题

本章摘要

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本章通过比较分析改革前后经济的增长、效率和结构,主要发现两点:一是改革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是居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经济增长表现为无效增长;二是改革前的无效增长同样伴随着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中消费份额下降,投资份额上升,投资结构严重偏向重工业,生产结构中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

通过简单的对比就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效率和结构问题与改革前的无效增长和结构变化如出一辙,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和延续性,这与我国经济改革奉行的渐进逻辑相吻合。在改革前的国家工业化战略下,中央计划尽可能占有和支配资源,计划经济的低效导致了大量的浪费,成为居民生活水平低下和经济无效增长的根源。近年来的经济结构问题则源于改革的放缓和停滞。

所有结构问题中,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份额的下降是基础性的,可以帮助理解其他经济结构的变化。居民收入份额的下降,会直接导致经济支出结构中消费份额的下降,以及投资和净出口份额的相应上升,并且进一步导致生产结构中工业份额的上升和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占比上升,与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直接关联。服务业发展的滞后,直接影响了居民生活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第一节 引言:以史为鉴

有一句古老的谚语是这样说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问题,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中的各种问题,在历史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过。虽然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环境不同,故事演化的细节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剥开纷繁复杂的表象,其背后基本的逻辑往往惊人地相似。本章回顾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的特点,并将其与改革以后的情况,特别是近年来所发生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相对照,探询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历史延续性。

历史延续性的问题,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中可能尤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改革奉行的是渐进的逻辑,改革并没有事先定好方向,而是“摸着石头过河”。措施的出台,往往是由具体的问题倒逼出来的,因而改革往往有滞后的性质。而改革措施又往往没有很系统的设计,不能全面解决问题,已有问题不会立即得到根治,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但依然持续存在,因而改革还具有不彻底性。滞后性、不彻底性,都要求持续不断地发现和解决问题,推进改革,否则问题就会越积越多,越来越难解。

关于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状况,我们现在常见的描述往往都是“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关于当时人们艰苦生活的描述,见诸各种文学作品和纪实报道。^① 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件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在决定分田单干之前,在一张纸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并约定如果队长因此犯法坐牢,他家的农活由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养到18岁。做出这样的举措,当然是由于分田单干在当时不被允许,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活困境。不是穷疯了,老实巴交的农民哪里敢犯“走资本主义道路”、“机会主义”这样严重的

^① “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的提法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稍后,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还说:“……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6页)

错误?

然而倘若我们查阅 1949—1978 年的经济统计数据,就会看到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并不低。1949—1978 年年均 GDP 增长率达到 4.16%,同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也不过 7.42%、6.65% 和 8.85%。1949—1978 年我国总人口从 5.4 亿增长到 9.6 亿,人均产值年均增长 2.17%,30 年内翻了接近一番。^①从纸面上的数据看来,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状况似乎没有那么差,至少不应该是“濒于崩溃”。“濒于崩溃”与 4.16% 的经济增速之间,存在一个亟待解释的矛盾。要知道,这一增长速度和世界同期的平均增速(4.63%,人均均为 2.57%)差不多,而这一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被称作是战后的黄金增长期。为了解这一矛盾,我们去挖掘中国 GDP 增长率这一抽象数字背后的故事。^②

简单的数据挖掘表明,导致数据和人们主观感受相去甚远的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前的经济增长缺乏效率,不能改善居民生活,居民不能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实惠。^③最突出的表现是,投资增长快,消费增长慢,从 1958 年到 1978 年,人均生活必需品几乎没有增加,大量的投资并没有转化为能够改善居民生活的生产,实质上是无效投资,这些无效投资构成的增长实际上是无效增长。理解无效投资和增长的一个角度是投资的折旧率很高,在较高的折旧率下,投资下去以后很快就折旧掉了。比如,倘若折旧率等于 20%,投资下去 3 年以后就折了一半,6 年以后就只剩下四分之一。所以,1958—1976 年的经济高增长,可以简单理解为用投资的方式把资源大量浪费掉,也就是扔掉。倘若如此,人民生活水平徘徊不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也就不难理解了。

因此,近年来讨论的沸沸扬扬的经济增长效率和结构问题,在改革开放之

① 中国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实际数据时间区间是 1952—1978。别国数据来源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经济统计表第 7.0 版(Penn World Table (PWT) 7.0, Heston et. al. 2011),时间区间日本为 1950—1978,韩国为 1953—1978,中国台湾为 1951—1978。如果用 PWT,中国人均增长 2.59%,总量增长 4.56%,高出大约 0.4 个百分点。

② 从经济增长率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表现并不差这一现象在以前的研究中已经有所关注,参见 Lardy(1978)。

③ 经济增长的效率一词并没有标准的含义,本文在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其一是经济增长是否提高了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其二是经济增长是否有效使用了现有的经济资源。

前就已经存在了,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改革之前三十年里国民经济的糟糕表现,不是源于没有增长,而是源于无效增长,是经济增长效率问题 and 经济结构问题极端恶化的表现。

1978 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扭转了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改革以后经济增长加速,经济结构总体上处于改善的态势。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又逐渐显现出来,并日益严重,迄今没有扭转的迹象。从渐进改革的角度,这其实不难理解。经济结构问题,无非是深层次的资源配置机制的映像,资源配置机制的改变是缓慢的。而我国的改革,奉行的是渐进的逻辑,需要不断推进,逐步解决问题,否则问题会逐渐积累,越积越深,甚至越变越坏。改革倘若放缓甚至停滞,问题就会显现;如不及时发现问题从而深化改革,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打个比方来说,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本章剩余部分的行文逻辑是:首先介绍 1978 年以前的经济增长,阐述我国改革开放前经济增速并不低。其次从主要物质文化生活用品的角度说明居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与经济增速之间形成明显的矛盾。再次分析经济增长的结构,说明改革前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投资的增长,而这些投资并没有帮助提高生活水平。在此之后,作者分析了上述问题的原因,发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和以此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特别是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政策,导致了资源高度向投资倾斜,特别是向重工业投资倾斜。在计划经济的无效配置下,资源大量浪费,表现在经济结构上就是消费占比的持续下降和投资占比的不断增加。最后,作者把近年来我国出现的经济结构问题与之前的经济结构问题作比较,尝试找出其中的历史延续性。

第二节 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增速并不慢

图 1.1 和图 1.2 分别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的实际 GDP 水平(1950 年不变价格)和增长率,是国民经济状况的一个总体描述。根据这两张图,结合历史事件,我们大致可以将改革开放前的国民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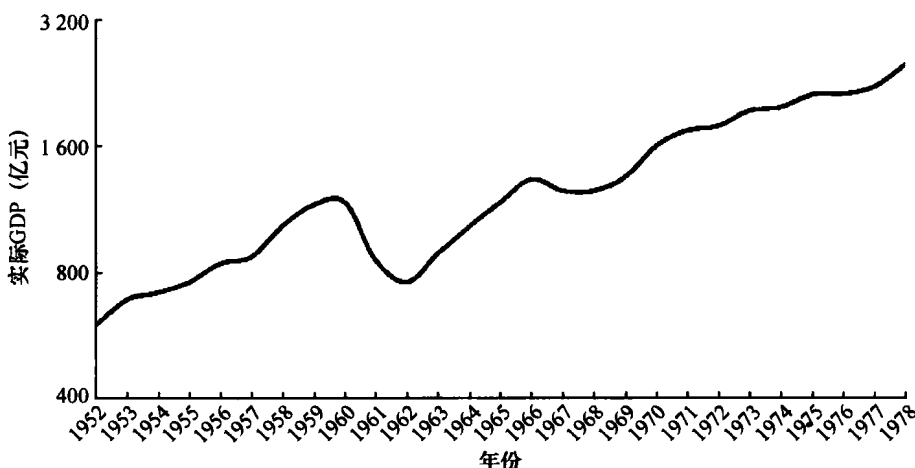


图 1.1 1952—1978 年实际 GDP

资料来源:实际 GDP 为根据《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名义 GDP 按照 1950 年价格调整所得,纵轴为对数坐标,数据从 1952 年起。

战后恢复(1949—1952)及“一五”计划时期(1949—1957)。连续多年的战争结束以后,国民经济在该阶段中得到恢复并实现较快增长,年均增速为 9.05%。第二阶段为“大跃进”造成的困难时期及调整时期(1958—1965 年)。实际 GDP 在困难时期大幅下滑,但在调整时期得到恢复,呈现“V”形特征。1958 年的 GDP 增速依然很高,但是 1958 年是“二五”开始之年,大跃进已经开始,所以我们把 1958 年划入第二阶段。^① 第三阶段为“文化大革命”和“洋跃进”时期(1966—1978 年)。实际 GDP 增速在该时期虽有起伏,历经“三起三落”,但 GDP 总量大致上是连年增长的。

图 1.1 和 1.2 显示新中国成立 30 年以来经济增速并不低,这一点可以通过与同期东亚邻国(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得到进一步的验证(表 1.1)。1949—1978 年间,我国内地地区的平均增速为 4.16%,香港地区的平均增速为 9.63%,台湾地区为 8.85%,日本为 7.42%,韩国为 6.65%。从数字上

^① 1959—1961 年期间经济大幅下滑,并造成人口大规模减少,史称“三年自然灾害”。但是根据大量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困难,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根据 Lin(1990)的研究,这三年期间的饥荒,主要是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的进一步推进取消了农民退出合作社的权利,进一步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导致粮食大幅减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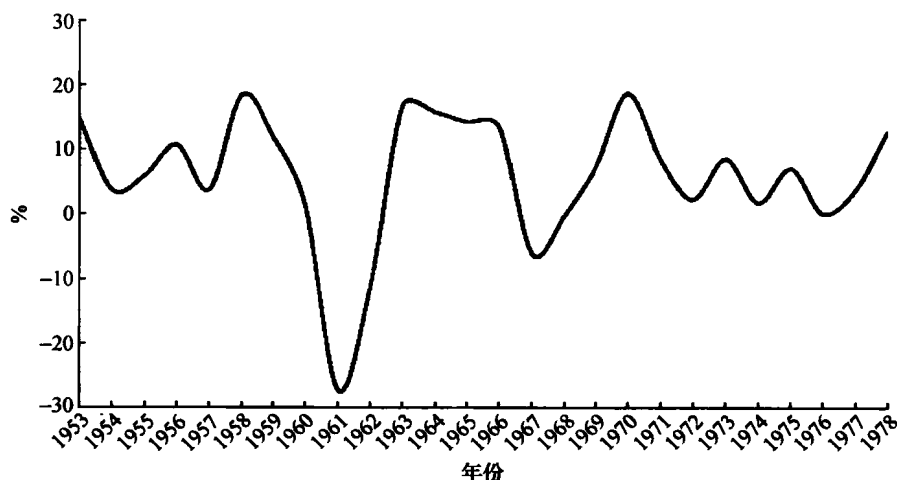


图 1.2 1953—1978 年实际 GDP 增长率

资料来源:实际 GDP 数据是把《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名义 GDP 数据按照 1950 年价格调整所得,GDP 数据从 1952 年起,增长率数据从 1953 年起。

表 1.1 1950—1978 年 GDP 平均增速比较

国家(地区)	1950 年 GDP (亿美元)	1978 年 GDP (亿美元)	年均增速 (%)	年均人口 增速(%)	人均 GDP 年增速(%)
中国大陆 1952	3 155	10 322	4.56	1.97	2.59
中国大陆(1)1952	599	2492	4.16	1.99	2.17
中国香港 1960	98	554	9.64	2.32	7.32
中国台湾 1951	102	1 115	8.85	2.67	6.18
日本	2 620	20 930	7.42	1.13	6.29
韩国 1953	380	2 000	6.66	2.27	4.39
美国	20 290	56 707	3.67	1.36	2.31
OECD	43 249	143 111	4.27	1.10	3.17
全世界 1960	91 946	211 493	4.63	2.06	2.57

本表比较了 1950—1978 年间我国和邻国及世界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大陆(1)的数据来自《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GDP 单位为亿元人民币(1950 年价格),其余数据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经济统计表第 7.0 版(Penn World Table 7.0),GDP 单位为亿美元(2005 年价格)。若 1950 年数据不可得,则选取 1950 年以后最早有数据的一年替代,国家(地区)后的数字标明该年份。OECD 国家排除了个别数据缺失的国家。全世界包括 PWT 1960 年有数据的 111 个国家。

看,4.16%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比日本、韩国也并未低太多。然而,中国大陆的情况是“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先后创造了“亚洲奇迹”,这构成了明显的亟待解释的矛盾。另外,同期中国大陆经济增长速度与美国、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以及全世界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差不多,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全世界经济增长普遍较快的年代,被称为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那么为何数据上看起来差不多,我国的国民经济却“濒于崩溃的边缘”呢?

第三节 居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澄清矛盾的另一个方面,即“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具体是如何体现的。GDP只是衡量国民经济的一个综合指标,不能完全反应经济的结构和绩效问题,不能全面描述经济各方面的状况,也不可能准确描述国民生活水平。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倘若大量的生产是无效生产,虽然GDP数字很好看,居民福利却可能没提高。一个常见的比方是,倘若雇用一个人在地上挖个坑再填上,付给他一天的工资,那么GDP的确是增加了,但是社会福利并没有因为挖坑而增加。^①这个故事或许看起来荒谬,其实可以在现实中找到许多原型。比如,计划经济下常常发生的事情是,花了很多钱建了个工厂,产品却没有销路,只好关门大吉,否则损失更大,其实就是挖了个工厂再埋上。^②

① 倘若这个人拿着他挖坑再填坑挣得的工资去买别人的东西,拉动了别人的生产,其行为的福利效果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挖坑填坑的实质与用直升机给居民撒钱是一样的,也就是增加货币供给。倘若面临经济不景气,经济体系缺乏流动性,放松货币政策对短期的宏观景气会有影响。倘若经济并不缺流动性而硬要增发货币,则会扭曲价格信号。

② GDP不能完全衡量福利水平是经济学界的一个共识。很多研究尝试提供更好的指标来评估福利水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 HDI),参见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2010)。另外,Arrow et. al.(2010)也提出了一个可能的方法。但是,新提出的指标往往难以测算,GDP仍然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事实上,虽然存在很多的缺陷,产出水平在长期内应该可以大致反映福利水平。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价格。新中国成立前 30 年,由于政府对价格的严格控制,资源配置通过中央计划而不是市场的方式进行,使得名义价格水平难以真实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所以我们应当考虑一些去货币化的指标。在 1949—1978 年,基于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很低的大背景,基本的生活需求,“吃”和“穿”,应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据恩格尔定律,低收入状态下人们的大部分支出都是在食物上。除了食物,穿衣保暖是人们的第二大基本生活需求。因此,我们从人均粮食占有量和人均棉花占有量这两个指标入手,一窥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状况。

图 1.3 是 1949—1978 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为了考察居民的实际粮食消费水平,我们考虑了粮食的进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等于粮食总产量加上净进口再除以总人口数。从图形形状上看,图 1.3 与前面图 1.1 和图 1.2 描述的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经济增长状况大致吻合。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与第二阶段特征与实际 GDP 变化特征大致相同,在第一阶段人均粮食占有量迅速增加,在第二阶段经历了一个“V”型的反转。人均粮食占有量



图 1.3 1949—1978 年人均粮食占有量

资料来源:人均粮食占有量等于粮食总产量加上净进口再除以总人口数。总产量和人口数据来自《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粮食进出口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1984》。

与经济增长状况的主要差异在于第三阶段,该时期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增速也有较大的起伏,但并不呈现连年增长的状况,而是基本处于徘徊状态。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人均粮食占有量基本恢复到“大跃进”开始时1958年的水平。但是在此后的十多年里,直到197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并没有显著增长,仍旧与1958年基本持平。人均粮食占有量在1958、1966、1977三个年份分别为299、292、304公斤,到1978年有一个较为显著的增长,达到324公斤。作为比较,1985、1990、2000、2010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分别为361、393、366、409公斤。考虑到粮食消费的需求弹性较小,此处的差别应该视为很大。1985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比1978年高出37公斤,多了11%多一点,但是按1985年的消费状况粮食已经吃不完,而1977年的情况是粮食不够吃,因此关于人均粮食占有量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人口增长。1949年全国总人口为5.4亿,1978年全国总人口为9.6亿。也就是说,1978年以前粮食总量的增加速度刚刚赶上人口增加速度,结果是人均粮食消费量大致保持在1958年的水平上。

图1.4是1949—1978年人均棉花占有量。和图1.3相比,图1.4的规律几乎是一样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幅增长,1958—1965年间经历一个“V”型的大



图 1.4 1949—1978 年人均棉花占有量

资料来源:人均占有量为总产量加上净进口除以总人口数。总产量和人口数据来自《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粮食进出口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1984》。